

桑田滄海又如何？

張鳴

快兩年了，一直被禁言，書出不了，文章不讓發，網絡上的發言平台、微信公號、微博和頭條號，也都被永久禁止發言。外面的演講，甚至網課都被禁止。對於我這個書呆子而言，原來就沒有多少日常的應酬，既然甚麼都不能做了，外面的來往應酬也就自然消失，只好宅在家裏，看看書，寫點根本沒有打算發表的文字。所以，疫情對我幾乎沒有甚麼影響，反正，無非就是宅在家裏，唯一的變化，是出門時鼻子上多捂了一隻口罩。從小到大，我一向以酷愛自由自詡，然而，一下子被剝奪了自由，也過去了。

因此，北京疫情起起伏伏，我都沒有太大的感覺。日子過得好像停滯了一樣。沒想到，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。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部告知，雜誌已經創辦三十年了。

最初跟這份雜誌打交道，是經過誰的介紹，我已經全然忘記了。大概沒有人介紹，在上個世紀末或者本世紀初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在中國大陸的大學圖書館裏還能見到，每期總有幾篇在大陸雜誌上不能發的文章。而我在那時，對中共的發迹史興趣濃濃，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怎麼回事。為自己解惑，對我來說，最好的方式就是鑽進去研究一番，可是，我又沒有本事繞着彎兒說話，用含糊的語言說話，只好把稿子投到《二十一世紀》。彷彿記得，早期有一篇文章，是寫土改的。

以此為契機，我這個那時還籍籍無名的小人物，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學，還講了一個學期的課。跟《二十一世紀》編輯部做鄰居，來往就多了。那個時候，來香港的大陸學人很多，各方的神仙都有。來香港，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《二十一世紀》辦公室轉轉，好像是必做的功課。那時候，人們心氣還挺高，經常行山，聚餐很多，人們放言高論，也不用擔心被人聽了，匯報給本單位的領導或者大陸的有關方面。由於都是大陸來的人在一起，跟香港本地人接觸不多，竟然沒有誰感覺到回歸後的香港的變化。

我在上那一個學期的課的時候，跟香港的本地學生有了一點接觸，還去過他們的家。據關信基教授說，這很不尋常，因為香港學生很少讓老師去自己的家，尤其還是一個大陸來的老師。他問我是不是特別愛香港，由此打動了學生？我說真的不是這樣，我就跟在大陸時一樣，那時怎麼待學生，到了

這裏也怎樣待學生。那時我想，大概是我教的學生，好些都是中產，家裏房子比較大吧。

就是這樣的一點點接觸，我感覺香港還是在變，顯然，是變得有點不好了。香港人的焦慮在提升，人們心裏還是隱隱然，還是有些不安。「自由行」政策之後，大陸的施恩感覺陡然升高，來香港的大陸人多了，香港人的感覺反而更不好了。大陸對香港的滲透，幾乎無所不在，愈來愈厲害。作為一個大陸人，倒是沒覺得有甚麼不便，以前打電話要買香港的號，後來連手機號都不用變了。唯一的不便，是曾經熟悉的小飯鋪，慢慢就不見了；那些能淘到好些好書的小書店，也沒有了。小小的社區圖書館還在，我在那裏還看到了我寫的書，街巷裏供的黃大仙像也在，小小門臉上，掛着的道教或者佛教的各種會社的招牌也還在。香港仔那些當街而坐的婆婆和爹爹，臉上還有一絲的微笑。但我隱隱地感覺到，也許，過不了多少年，這些也會消失或者變味。

一個外籍的香港記者對我說，用不了多少年，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內地的城市。誰也沒有想到，這一天來得這麼快，冷不防，大變和突變就降臨了。在內地玩微信的人，都習慣把香港叫成漁村，那是因為，「香港」早就是敏感詞了。但是，香港能變回到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漁村嗎？這個在鴉片戰爭過去沒多少年，就讓王韜和康有為感歎不已的城市，今天，其繁華已經跟當年沒法比了。但是，如果衰敗起來，也許就像雪崩似的。

在人類歷史上，有過多少的輝煌，就有過多少的廢墟。一座繁華似錦的城市，變成一文莫名的廢墟，用不了太多的時間。用不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單單人類自己作孽，就足矣。建設起來很難，往往得幾輩子、十幾輩子的奮鬥和努力，但是，廢掉一座城市很容易，稀哩嘩啦，也就完了。人類社會，滄海桑田，桑田滄海，一旦桑田變成了滄海，再變回來，幾乎沒有可能。

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唸小學和中學，是沒有上過地理課的。但我從哥哥姐姐的地理課本上看到，香港，是中國最好的良港，岩岸型的良港，吃水深，防風效果好，港區面積大；比上海好，寧波好，青島好，比大連還好。

可是一旦進出口萎縮，再好的港口，也會空空蕩蕩的。這一切的到來，只要香港不再是香港，她身上那些有別於大陸城市的味道，有一天就全然消失了。

我們的黨史教材上說，1925年，國共合作組織的省港大罷工，曾經讓香港變成臭港、死港。我不大相信，因為罷工持續了一年，難道剩下的香港人臭了一年，死了一年？但在罷工初起之時，變臭甚至停滯，倒是可能的。不是因為資本家拖欠了工資，也不是因為印度巡捕虐待了港人，一場反帝鬥爭就鬧得天翻地覆，驚天動地，十幾萬在香港工作的人呼喇喇回到了廣州。回頭看，感覺中國人可是真能折騰，真好折騰。

作為身在大陸的一個小百姓，這大半年深切感到的，是民生之艱難。疫情還沒消退，南方的水災卻鋪天蓋地，老百

